

近代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与发展

□ 张艳茹

近代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

20世纪20年代末,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日本史学界产生并迅速发展,成为日本近代重要的史学流派之一。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得以产生,与明治末期以来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引介及研究积累有关,同时更是借由一战后社会意识分化大背景下社会主义运动的直接推动。

近代日本引介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以德国为主的欧美国家,如留学德国的三木清回国后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等;二是俄国,特别是十月革命的胜利,推动了马克思、列宁思想在日本的传播。不过,尽管马克思主义思想早在19世纪末就已传入日本,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运动也使学界及民众对其有一定的关注,但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日本仍主要被应用于经济分析领域,很少用于历史及社会形态分析,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还未从其社会科学理论中独立出来。

1922年7月,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日本共产党建立。日共的建立及共产国际的相关指导,成为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的直接契机。1922—1926年,日共经历了建党、被迫解散到重建的过程,在此期间其内部就日本社会性质、未来斗争目标及方式有重大意见分歧,部分人开始意识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日本历史及现状的必要性。而日本在20年代经历了一战后的经济萧条、1923年关东大地震、1927年金融危机等,工农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等凸显,面对复杂的社会局面及深刻的社会危机,各界纷纷寻求解读社会现状的理论及解决问题的方法,活跃的思想探讨引发社会意识的分化。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一种认识社会的理论和方法,是应消除日共党内纷争及解读日本社会的双重需求产生的。

1927年共产国际制定并发布《关于日本问题的决议》(《二七年纲领》)前后,马克思、列宁等人的历史分析理论和方法在日本开始被应用于史学研究。《二七

年纲领》指出,日本仍是“半封建国家”,共产党当下的任务是领导无产者和农民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废除君主制。受此判断及目标引领,野吕荣太郎、羽仁五郎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经济学家,开始探究日本资本主义是在怎样的历史前提和条件下,在保留天皇制和寄生地主制制的同时发展起来的。正是在这些探讨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得以从其社会科学理论中独立出来。

近代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历程及主要成果

1927—1928年,野吕荣太郎的《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服部之总的《明治维新史》在政治批判社编的《马克思主义讲座》上连载。野吕在《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中提出,为掌握当时社会的基本矛盾,需探讨明治维新变革、日本的产业革命及其政治、社会表象等,以阐明日本走向近代时的特殊性质。羽仁五郎于1929年出版了《转型期的历史学》一书,书中批判了当时史学研究逃避现实问题的倾向;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唯物史观和发展阶段理论;提出应该用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的理论来书写世界历史。可以看出,野吕、羽仁等已开始应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解析日本历史及现状。

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逐渐形成一定规模。“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唯物论研究会”等研究组织相继成立,研究者们开始策划出版刊物及丛书,诸多领域亦展开了活跃的学术讨论。

1930年秋,日共宣传部长岩田义道和野吕荣太郎、羽仁五郎、渡部义通等策划写作《日本通史》,后因岩田受检举被捕,计划未能实施。尽管如此,野吕和渡部还是召集研究者分别就日本资本主义史和古代奴隶制开展了共同研究。前者的成果是《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讲座》(1932—1933年),后者的成果是《日本历史教程》(1936—1937年)。这两部书是战前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性成果。

《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讲座》由日本当时马克思主义史学、经济学主要研究力量撰稿,陆续出版7卷,社会反响很大,也引发了“讲座派”和“劳农派”围绕日本资本主义性质的论战。实际上,1927年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就明治维新的性质、日本资本主义性质、天皇制权力的阶级属性、地主土地所有制等展开过各类论战,史称“日本资本主义论争”。通过这些论战,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自我认识不断深化,社会影响也逐渐扩大。

1933年左右,日本政府对社会主义运动的镇压加剧。1934年,“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等被迫停止活动。同年,野吕荣太郎病死狱中。在镇压社会主义运动、取缔社会主义思想的同时,日本政府逐渐强化以“国体论”为支柱的近代天皇制意识形态,在史学领域“皇国史观”呈现碾压其他史学思想之势。

在严酷的环境下,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本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马克思主义史学不再如先前那般活跃,部分马克思主义史家开始以学术研究对抗“皇国史观”。羽仁五郎及其门下和渡部义通的《日本历史教程》共同研究小组成为引领者。

《日本历史教程》第一册和第二册于1936—1937年出版。该教程依据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等论断,探究了日本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发展的历程及早期国家性质,对“国体论”中的神国说、“万世一系”说进行解构。与此同时,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宗教史、思想史领域也展开了对抗唯心主义史观的研究。秋泽修二、永田广志合著的《现代宗教批判讲话》(1935年)、佐木秋夫的《唯物论全书宗教教学说》(1937年),都是遵循唯物史观的宗教研究著作。在思想史领域,马克思主义史家注重探究思想及文化之中隐藏的政治意图,并对其进行意识形态分类,这在之后的思想史研究中成为一种范式。

20世纪30年代后期,在政府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高压管控下,马克思主义史

家的研究活动进一步受限,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三种倾向: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特别是古代史研究领域,开始出现理论论和实证相结合的倾向;在学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方法获得了知识分子群体的更多关注;受羽仁五郎等影响,一大批年轻学者如石母田正、远山茂树、藤间生大、和岛诚一等逐渐成长,并成为日本战后历史学的核心力量。

近代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特征

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自产生起,便十分重视理论的吸收、创新及本土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布哈林等关于历史的诸多论述被引介到日本,其中社会发展阶段理论尤为受到重视。而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出现“资本主义论争”“古史论争”“亚洲生产方式论争”等多种学术论战,以及不懈地讨论普遍性和特殊性等问题等,与理论本土化过程之中理论解释的分歧密切相关。注重理论的同时,近代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还展现了较强的政治实践性,如对抗天皇制意识形态、为社会主义革命实践寻找理论依据等。正因如此,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存在初期受政治影响大、实证性偏弱、机械套用理论等不足。特别是受共产国际及日本共产党的政治影响较大,两者内部的斗争和分歧深刻影响了史学研究。

尽管如此,这并不能抹杀马克思主义史学给日本史学研究带来的变革。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以前,日本学院派史学研究较缺乏理论性,且基本不探讨明治维新之后的历史。近代马克思主义史学活跃的理论探讨,致力于探究社会问题、寻找解决方法的强烈现实关怀,对各种唯心主义史观的批判,切实为日本史学研究注入了活力、拓展了研究领域。另外,其注重从整体社会结构分析入手,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和必然性的研究模式,为广区域、长时段、通史式的历史研究提供了理论和方法,并深刻影响了日本战后历史学的发展。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帕尔米拉的兴衰沉浮及文明交往特征

□ 龙沛

2021年9月,深圳南山博物馆展出了来自叙利亚的195件古代珍贵文物,这个饱受战火蹂躏的国家所拥有的辉煌古代文明再次引起了国人的热切关注。在叙利亚古代文物展中,来自希腊化和罗马帝国时期的帕尔米拉文物可谓展品中的翘楚。帕尔米拉作为由阿拉伯沙漠游牧部落定居后与当地阿拉伯语族群融合而建立起来的绿洲商贸城市,自希腊化时期以来便扮演着连接东西方贸易路线之中中转站和大宗商品集散地的角色。研究帕尔米拉这颗“沙漠明珠”在希腊罗马时代的作用,有利于充分认识这一时期以该城为代表的古代叙利亚文明的发展特征。

“帕尔米拉(Palmyra)”一词来自拉丁文“椰枣(palm)”,阿拉伯人称之为“台德穆尔(Tadmur)”。公元前两千纪的亚述阿卡德商业文献第一次提到台德穆尔,而希伯来语《旧约》圣经则称台德穆尔由以色列国王所罗门所建。进入希腊化时期后,台德穆尔成为塞琉古王朝统治下繁荣的东西方贸易城市。公元前64年庞培征服叙利亚后,台德穆尔以帕尔米拉之名进入罗马帝国统治下,但仍然保持着独立城市的地位。公元14年后,帕尔米拉正式成为罗马帝国的一部分,由叙利亚行省管辖。公元32年,帕尔米拉人修建了恢宏壮丽的巴尔神庙,而其城墙要塞设施也于公元1世纪期间逐渐完善。公元75年,维斯帕芗皇帝命人修筑了连接帕尔米拉到幼发拉底河岸苏拉城的道路。由此可见,帕尔米拉自公元1世纪起便受到罗马帝国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在罗马帝国的庇护和支持下,帕尔米拉成为罗马—帕提亚之间政治博弈和从波斯湾至东地中海商路沟通的战略据点和贸易中继站。

公元2世纪后,随着罗马帝国兼并纳巴泰王国造成的商路北移,帕尔米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开始进入繁荣鼎盛期。与此同时,帕尔米拉的领土也逐渐由帕尔米拉城向周边地区拓展,成为罗马帝国东方颇具经济实力的自治城市。公元129年,

哈德良皇帝亲自拜访了帕尔米拉,将自己的名字和自治市地位赐予该城。在哈德良的推动下,帕尔米拉市政建设呈现出希腊罗马文化与东方本土文化传统相交融的特点。帕尔米拉的罗马式剧场、柱廊广场和纳布神庙均在安东尼王朝时期得以落成。根据阿拉伯史家的记载,来自阿拉伯人的四大部落的贵族成员共同构成帕尔米拉市议会的主要代表。帕尔米拉引进希腊罗马城市管理制和艺术风格的同时,仍然保留了阿拉伯部落贵族会议的政治制度和叙利亚本土神祇(如巴尔、纳布)的混合崇拜。

进入3世纪中叶后,罗马帝国先后遭到波斯人和哥特人的大规模入侵,内乱外患频仍。在这样的背景下,帕尔米拉的政体也开始由贵族会议制向君主制发展,其标志便是出身帕尔米拉四大部落的首长权力迅速扩大,并由一个“首领(Res)”来总领帕尔米拉内外事务。自公元252年起,帕尔米拉首领奥登纳图斯开始自称帕尔米拉总督,显示出强烈的独立自主倾向。不过,从公元261年起,奥登纳图斯在叙利亚境内先后击杀僭位称帝的叛军领袖,以表明自己继续效忠罗马帝国的政治姿态。由于重整罗马帝国东方局势的功劳,奥登纳图斯被罗马皇帝加里恩努斯授予“东方全境大统帅”称号,兼领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阿拉伯半岛和安纳托利亚诸省。公元263年,奥登纳图斯从波斯凯旋之后被加里恩努斯皇帝授予“伟大的波斯征服者”称号,同时加号“东方王中之王”。公元266年,奥登纳图斯再次率军东征波斯,直达其首都泰西封城下并大掠而还。公元267年,奥登纳图斯与其子海兰一世于波斯撤军回程途中遭到暗杀,仅10岁的幼子瓦巴拉图斯在其母后芝诺比娅的摄政下继位。

芝诺比娅在继承奥登纳图斯事业的同时,将帕尔米拉从罗马帝国附属国向完全独立的帕尔米拉帝国发展。自公元270年起,帕尔米拉帝国开始对外扩张,

芝诺比娅派军攻占了罗马帝国纳巴泰—阿拉伯行省首府波斯特拉并洗劫了该城。同年11月,安条克的铸币厂也不再发行印有罗马皇帝克劳迪二世的钱币,开始把瓦巴拉图斯的名字刻在新铸的钱币上,这表明帕尔米拉帝国已经不再奉罗马帝国为宗主。不过,这一时期的阿拉伯行省界石铭文仍然使用罗马帝国的复合式头衔“杰出者,国王,执政官,大统帅,罗马公爵”称呼瓦巴拉图斯,由此可以看出帕尔米拉与罗马帝国关系的复杂性和微妙性。

公元271年,芝诺比娅自封奥古斯塔,封瓦巴拉图斯为奥古斯都,俨然以罗马帝国继承者自居,帕尔米拉帝国的扩张至此达到巅峰。然而好景不长,公元271年底奥勒良皇帝开始率军渡海峡反攻进入小亚细亚,帕尔米拉军队连战连败。公元272年初,罗马将军普罗布斯又从帕尔米拉人手中收复了埃及。芝诺比娅率军在安条克近郊的伊米亚迎击罗马军队失败,随后在艾米萨之战中再败后退回帕尔米拉,奥勒良遂将帕尔米拉团团围困。芝诺比娅试图逃出城外前往萨珊帝国求援,最后于幼发拉底河边被罗马军队俘获。帕尔米拉城随后投降,至此称雄罗马帝国东方达十余年之久的帕尔米拉帝国宣告灭亡。

帕尔米拉帝国的命运虽然依附于罗马帝国,但也留下了人类历史上宝贵的文明交往遗产。从公元前3世纪孔雀帝国在阿富汗留下的铭文中提到台德穆尔便可以看出,该城在希腊化时期丝绸之路远程贸易中已经开始扮演重要角色。在罗马帝国时期,以帕尔米拉为核心的

区域贸易网络从波斯湾的卡拉克尼经帕尔米拉延伸至东地中海的安条克,而帕尔米拉商人的船队也在波斯湾和印度西海岸之间往返贸易。在贸易鼎盛时期,帕尔米拉商人的足迹遍及罗马世界的杜拉—幼罗斯、巴比伦、塞琉西亚,尼罗河流域的科普托斯,波斯湾的巴林,印度河三角洲以及中亚南部的木鹿等地,形成连接中亚、西亚、南亚和地中海世界的规模庞大的跨国贸易网络。丝绸是帕尔米拉商人中转贸易的主要商品,帕尔米拉出土的中国丝织品生动地证明了汉代中国和罗马帝国的贸易往来。除丝绸之外,帕尔米拉商人经手的贸易商品还包括香料、宝石、象牙等其他大宗商品。帕尔米拉商人团体实际上扮演了丝绸之路西段贸易的中介者角色,对罗马帝国的西方贸易提供了强大的经济支持,丰富了由波斯和中亚商人主导的传统丝绸之路贸易网络格局。

另外,位于罗马帝国、波斯和阿拉伯沙漠之间结合部的有利位置,也使帕尔米拉得以充分吸收周边各大文明的成果。在帕尔米拉,罗马式的柱廊、希腊式的神庙与帕尔米拉人崇拜的本土神祇融为一体,而帕尔米拉浮雕和壁画中的骑射手形象则是汲取帕提亚和萨珊波斯军事文化的结果。帕尔米拉所汇聚的东西方文明元素,生动体现了公元1—3世纪希腊罗马文明与古代叙利亚文明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领域的深度交流和互鉴,也体现了古代近东文明在希腊罗马时代文明交往的普遍性。

(作者系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讲师)

1902年,巴黎的索邦广场矗立起一座雕像,雕像的中央是实证主义和社会学的创始人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年),孔德的两侧分别是一位沉思的无产者和一位怀抱婴儿的妇女。孔德、无产者和妇女分别象征着理性、行动力和爱。这个雕像寓意着孔德的社会理想:用实证哲人的理性指导无产者的行动,实现大革命宣扬的博爱。甘必大、费里、利特雷等“建国之父”是实证主义的推崇者甚或信奉者,实证主义也因此被一些学者称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官方哲学”。

孔德的思想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青年时期至1847年,他致力于综合各类实证科学知识、创立实证哲学,这一阶段的代表作是六卷本的《实证哲学教程》;1847至1857年,他致力于将实证哲学变成宗教——人道教,这一阶段的代表作是四卷本的《实证政治体系》。他呼吁富有同情心的妇女和富有行动力的无产者“加盟”精神权力,与富有理性的实证哲人形成新的“三位一体”,倡导人类的团结和利他的情感。晚年的孔德倡导“爱·秩序·进步”,这概括了其关于法国社会重组的基本构想。

孔德将“秩序”视为社会重组的基础,认为19世纪初的法国处于严重的“失序”状态,大革命破坏了旧秩序却未能稳固确立新秩序,“三十多年中间,竟然出现过十多部宪法”。在孔德看来,动荡源于革命者信奉的政治学说建立在形而上学的基础之上。他们用想象出来的政治蓝图指导行动,而非观察社会事实并按科学规律办事。孔德接续孔多塞、观念学派和圣西门的努力,致力于使政治成为实证科学。他认为政治科学应成为一门总体性的科学,研究包括生产、政制、道德等在内的一切社会现象,并将这门科学命名为“社会学”。社会学包括静力学和动力学:前者研究社会各部分如何相互协调达成秩序;后者研究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规律。

对西欧近代社会的动力学研究,使孔德明确了法国社会重组的方向。他指出,中世纪的西欧确立了由封建贵族和天主教士主导的军事神学社会体系。自16世纪以来,它遭遇实业家和科学家的挑战并趋于瓦解,法国大革命标志着持续三个世纪的解体进程的顶点。孔德认为18世纪的使命是破坏旧秩序,19世纪应转向建设新秩序。只有确立实业科学社会体系取代旧体系,革命才能完成。这意味着在世俗领域,要让有才能的实业家取代贵族掌权;在精神领域,要让有才能的科学家取代教士掌权。

关注秩序重建的孔德不是守旧的秩序党人,他认为社会应在“秩序中进步”。他指出,古代和中世纪的社会都为少数最强者的利益服务,实业科学社会应增进全体社会成员的福祉。这意味着要改善缺乏知识和财富的大多数人、包括最贫苦无依者的境况。

19世纪30至40年代,贫困问题在法国引发普遍关注。孔德以社会科学的名义,批驳了当时的主流观点——捍卫绝对的私有财产权反对政府干预个人竞争。孔德指出:把财产权绝对个体性的存在、认为个人有使用甚至滥用财产的绝对权利,这是一种反社会的财产观。事实上,那些表面看来纯属个人的劳动成果,没有哪样不是社会成员分工协作的产物。每个人都得益于与同时代人和此前无数代人的劳动分工,因而每个人都有扶助其他社会成员的义务。

孔德反对同时代空想共产主义者解决贫困问题的方案。他批评后者不了解生产领域的科学规律,完全否定个人的自发性,追求绝对的平等。孔德认为应当认可个人对利益的追求,并让有才能的实业家组织和管理生产。不过他也看到,生产领域的竞争和个人的利己倾向若不加以节制,将导致弱肉强食和财富寡头的专制。他设想确立新的精神权力来约束实业精英的世俗权力,正如中世纪盛期的教会约束王权。掌管新精神权力的将是熟谙各门类科学知识的实证哲人,他们应同时独立于世俗权力和公共舆论。孔德期待实证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公众对其的自愿接受,从而促成新的精神权威的诞生。实证哲人将成为新时代的教士,对全体社会成员进行实证教育,引导他们尊重社会规律并承担道德义务。

自1831年起,孔德身体力行传播实证主义。他每周日给公众义务讲授天文学,直至1848年革命爆发。从1849年起,他为公众讲授人类历史,直至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才被迫停止。《实证哲学教程》出版后,孔德有了一些颇有影响力的追随者,但他的宗教转向导致其学派的分裂。1851年,孔德最得意的弟子利特雷与他分道扬镳。利特雷将实证哲学与孔德第二阶段的思想剥离之后,继续大力传播实证哲学。作为著名的词典编纂家、法兰西学院院士、参议员和媒体人,利特雷在40年间成功地将实证哲学推广为人知。利特雷是共和主义者,促成了实证主义与共和

孔德的实证主义与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

□ 倪玉珍

主义的融合。

继利特雷之后,数学家和哲学家拉斐特成为孔德最得力的弟子。孔德逝世后,拉斐特领导“完全的实证主义者”,即接受孔德全部学说的弟子在50年间大力传播实证主义。1880—1888年,拉斐特得到教育部长费里的支持,得以在索邦大学公开讲授实证主义。1892年,法兰西西学院设立首个科学史教席并将其授予拉斐特,这被实证主义者视为该学派取得重要胜利。

经由孔德弟子的努力,实证主义对第三共和国产生巨大影响。历史学家拉维斯、社会学家涂尔干、法兰西学院院士勒南和泰纳等许多著名学者都受其影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朗士说道:“这个时代所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头脑,都渗透着孔德的了不起的思想。”法朗士认为,孔德的贡献包括有力地批评了形而上学、加强人们对实验方法的信心、综合各门科学知识,以及提出建立在人类团结基础上的新道德学说。

在政界,担任过议长和总理的甘必大曾屡次公开称赞实证主义,并借助后者推行反教权主义运动。担任过总理和教育部部长的费里被同时代人视为“公开的实证主义者”,他提出的《费里法案》规定了普及、义务、免费、世俗的初等教育。该法案是实证主义理想与法国现实妥协的产物。孔德主张精神权力应独立于世俗权力,这意味着国家应与教会分离,并且不介入公共教育。然而面对多数法国人信奉天主教的现实,费里主张推迟政教分离。为了保共和,费里还主张由国家掌管公共教育,使公立学校成为传播共和主义的阵地。尽管有上述妥协,费里仍践行了实证主义的重要理念:教育世俗化、传播实证科学、思想包容、重视道德教育。

实证主义还为共和派政治家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了一些启发。他们认同实证主义倡导的“秩序与进步”,一方面反对不满现实者用暴力推翻秩序的企图,另一方面积极探索社会变革之道。第三共和国的著名政治家布儒瓦提出团结主义理论,强调社会成员相互依存,这与孔德的社会学说一脉相承。关于“社会团结”的学说,也为第三共和国赋予公民“社会权利”提供了理论基础。共和国向私人财产征税,并将税收用于补偿在劳动分工中受损的群体,后者获得补偿的权利被称为“社会权利”。

孔德的思想不仅为共和派所用,也为右翼保守派所用。例如保王党人莫拉斯利用孔德的说教反对民主代议制和个人权利。孔德还对工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例如法国印刷工联盟的负责人、协助创建法国劳工联盟和法国总工会的克弗信仰人道教,巴黎公社成员蒂纳尔也信奉实证主义。

自19世纪90年代起,实证主义在第三共和国的影响逐渐减弱。不过,直至二战期间仍不乏有影响力的学者关注孔德。二战后至20世纪90年代,法国先后兴起马克思主义和以托克维尔为主角的自由主义思想热潮,孔德的思想被遮蔽。不过孔德诞辰200周年时,法国又兴起研究孔德的小热潮。一些学者试图借助实证主义反思“新自由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局限,为法国的社会危机寻求解决方案。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世界史

理论部主办 电话:67078654